“字辈”是家族生命的潜流

何登保

编者按

为了体现宗族关系，我们通常在起名时需找一个共同用字，不同辈分的共同用字排列起来就形成了这个家族用以标明世系次第的字辈。字辈的形成就是为了分尊卑，别长幼。它的使用，对一个大家族，尤其是绵延数十代，繁衍达数十万的持久型家族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

字辈，就是一种便于固定、便于实行、便于审视、便于继承的家族化的文化形态，是一个家族文化得以延续的缆索。我们相信，只要这个形态在、缆索在，后人就可以抚摸到祖先的根脉，先辈凝聚的精神种子就有可能存活，家族优良的文化传统就可以得到赓续和承继。

电视剧《父母爱情》开播以后，即风靡大江南北，至今热度不减。

主人公江德福与安杰之间的对话，在家长里短中蕴含着浓浓的生活气息。江德福为他未出生的儿女取好了名字，“江昌龙”“江昌凤”，让安杰大大地奚落了一番，认为“这是土得掉渣的名字”，并说这“龙”“凤”是皇帝皇后用的名字，“兄妹俩用这名字，不乱了套吗？”江德福自知自己没有文化，告诉安杰：“如果你觉得这名字不好，可以再起一个，不过这前面两个字不能动，一个也不能动！”安杰说：“为什么？‘江’不能动我知道，这‘昌’为什么不能动？”江德福一本正经地说：“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懂呢？‘昌’代表着辈份，就像我这名字中间的‘德’字一样，一听到我的名字，就知道我是什么辈份！”安杰说：“什么狗屁辈份，我不干！”江德福理直气壮地说：“这不是干不干的事，这是老祖宗立下的规矩！”安杰随即反唇相讥，“穷得连饭都吃不上，还那么多穷规矩！”

这段对白，江德福说的是实情，安杰的嘲笑有些强词夺理。字辈是中国传承千年的重要取名形式，也是中国古代一种特别的礼制。

我就是在“穷得连饭都吃不上”的年代，明白自己的“辈份”的。

我出生的那个小村庄，共六七户人家，只有两姓，一姓何，一姓朱。我们何姓是个小姓，我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来，祖祖辈辈，都默默无闻地在这片青山绿水间，向土地里讨生活。应该是在我上小学的时候，一个远房本家，来到我们的小村庄。这位本家，略通文墨，他把我们何姓小辈召集在一起，说起我们家族的渊源。那些远古的故事，我已经忘记了，只记得他告诉过我们家的辈份承传，其中有“大学宜世家，道先登邦国，诗书礼后昆”。我对这个字辈深信不疑，因为我从自己的辈份往上数三代，父亲是“先”字辈，祖父是“道”字辈，曾祖是“家”字辈。那位“家”字辈的长者就坐在我们的现场。皓月当空，桂影斑驳，月下的老人白发苍苍，目光深邃。在我们小孩子的心目中，原以为，那位长者就是我们家族的创始人。原来，白胡子老人，也曾年轻过，也是从字辈中走过来的。于是，我对这些字辈产生了敬畏感！虽然我当初并不明白这辈份的来由与意义，但确如江德福所认知的那样，“是老祖宗立下的规矩”！

后来读书了，接触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对字辈才略知一二。

字辈也叫字派，是指名字中表示家族辈份的字。为了理清宗族里世系血统的顺序，一个家族通常由饱学之士或集体创制一套表示辈份的文字，然后全族依序共享共用。

从现有资料看，首次出现字辈可能在宋代，奠基人是宋太祖赵匡胤。赵匡胤兄弟五人，长兄赵匡济，弟赵匡义、匡美、匡赞。可见从赵匡胤一代开始，就已经有了统一的辈份，赵匡胤还为后辈钦定了派系字辈。自此以后，几乎所有的家族都排起了字辈。辈份，对于一个人来说，一生下来就被确定了，自己别无选择。在中国古代，同宗族之间的辈份是严格遵守的，比如说称呼必须准确，日常生活中晚辈要向长辈请安、敬烟、让座、让路，座次上也十分讲究，不能乱了礼法。

因为我的姓氏是小姓，从我上小学乃至高中，班级没有同姓的同学，工作以后，因为是一所小规模的山区中学，也没有同姓的同事。以后，调入舒城中学，才有了一位同姓的老师。这位老师，字辈为“修”，他的年龄比我大，他说他的辈份比我小，要小两辈。于是，在私下的场合，他总称我为“老爷老爷”的，叫得我诚惶诚恐。其实，本家老师也是缘着辈份这么称呼我的，因为，在舒城县杭埠的后河村，何氏的字辈是“建立先登本，修齐贵正诚”，这位何姓老师的字辈中果真有“先”“登”两辈与我们谱系中的字辈重合。一笔写不出两个“何”，都是一家人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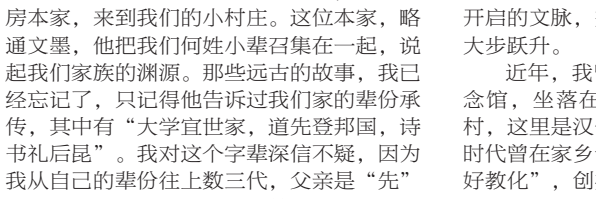
我们寻常百姓，重视辈份，可能只是为了规范取名，并在宗族中明确世系，分辨亲疏尊卑。但对一些名门望族，他们重视辈份，对上要寻根问祖，对下更要承传家风，光耀门楣。

我至今还记得，大学读书时，中国文学史课程的老师说，清代著名的戏剧家孔尚任是孔子的后辈。在写这篇文章时，因为好奇心，我翻开新版《辞海》“孔尚任”词条，果然有孔子“六十四世孙”的记载。“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涵养着中华文明几千年绵延兴盛的精神根脉。自古名门多才俊，孔尚任以一出《桃花扇》而闻名，与《长生殿》的作者洪昇，被世人并称为“南洪北孔”，他们是康熙时期照耀文坛的双星。孔尚任传承了孔子开启的文脉，并实现了由思想家到文学家的大步跃升。

近年，我曾参观过文翁纪念馆。文翁纪念馆，坐落在舒城西南山区的春秋乡文冲村，这里是汉代人文翁的出生地。文翁少年时代曾在家乡读书，以后“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创办“石室精舍”，开启了中国官办学校之先河。前些年，我去成都，因崇拜文翁，曾慕名前往著名的石室中学。悠悠千载，似水流年，校园里，古老的汉阙见证了锦江的风雨，参天的银杏更让你体悟到根深才能叶茂的道理。舒城文翁纪念馆里展出的丰富资料，足以让我们对这位远古的乡贤肃然起敬。但是，我很感兴趣的还是关于文翁与文天祥的谱系记载。纪念馆里有一大块展板，绘制出文氏家族古往今来的字辈脉络，我在这张脉络图中，清楚地看到了文天祥的名字！

文天祥会是文翁的后人吗？我有些意外，在我的印象中，文天祥是江西庐陵人，与舒城文氏果真有关系吗？过后，我从《文天祥家世考》中获取这样的信息：“庐陵文氏来自成都……其始祖为文时，时字春元，原为成都人，是汉景帝时蜀郡太守文翁的后裔。”沿波讨源，凿凿有据。文天祥像他的远祖一样，原本也是一介书生，他本也可以像文翁一样，兴办教育，经邦济世。但他生活在南宋末年，“山河破碎风飘絮”，他以一个书生的柔弱之肩，扛起了国运。南宋小朝廷覆灭时，只有他一个人保持着不可覆灭的气节，“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把宋代文人的人格力量做了最后的展示，也把他的远祖文翁的家风发挥得淋漓尽致。

近读余秋雨先生的《何谓文化》一书，书中记载他曾受著名的电影导演谢晋生前所托，为其撰写碑文。余先生撰写的碑文，开始就交代了谢晋系名门之后：谢晋先生，浙江上虞人氏，东晋谢安、谢玄之后也。取晋为名，以表传承。悠悠千年，果然继其先祖创拓之脉，引领中国电影事业而成一代宗师。



家谱中的字辈

木得其本，水知其源，中国古老的姓氏字辈是一个家族的生命潜流，散落在五湖四海的家乡人，一旦论起字辈来，就不会有“大水冲了龙王庙”的误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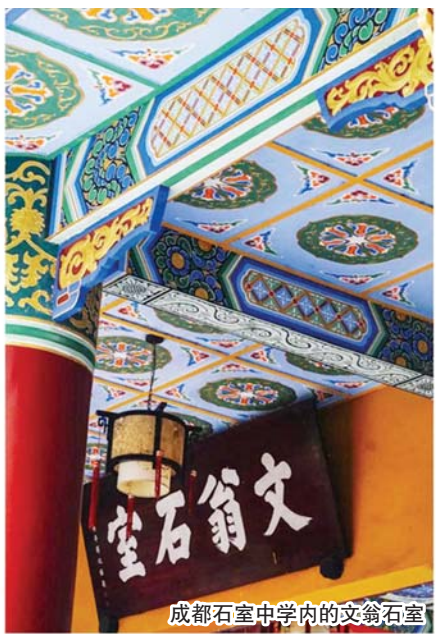
字辈的制定，并不是文字上的胡乱堆积。就我有限的见闻来看，字辈的含义没有一个是消极的，都是规劝族人奋发努力，爱国爱家，守信诚实，尊老爱幼，和睦相处，同舟共济……比如韶山《毛氏宗谱》的字辈：

立显荣朝士，文方运济祥。
祖恩贻泽远，世代永承昌。
孝友传家本，忠良振国光。

这些字辈包含了忠孝文化、耕读文化等信息，也有修身齐家、安民治国的愿景。

当然，也有的字辈有些另类，从中可以看出命制者的文化个性或人格追求。南宋大儒朱熹字辈为“火”，朱熹的儿子朱塾为“土”，孙子朱钜为“金”，曾孙朱渊为“水”。根据古代文化中的“五行”命名辈份，依次是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有《殷氏家谱》中的二十个字辈为：春游芳草地，夏赏绿荷池，秋饮黄花酒，冬吟白雪诗。我们于此似乎可以想见其祖先那种诗意的人生。

舒城文翁纪念馆



成都石室中学内的文翁石室

《红楼梦》中，曹雪芹虽然没有严格地依照字辈去为贾府的几代人命名，但我们从几代人的名字中，还是可以看出作者有很强的字辈意识。第一代，贾府发家的起点，来自于一母同胞的两个兄弟，宁国公贾演和荣国公贾源。演、源两字皆有水字旁，取源头活水之意，亦是暗示天子雨露恩泽。第二代是贾代化、贾代善，此时天下太平，贾府深知富贵荣华得来不易，所以在家业初创后，开始教化子孙，向上向善，代代相传。到了第三代，名字中都有一个文字旁，贾敬、贾赦、贾政、贾敏，他们希望子孙能通过科举文化之路，继续振兴家业，光宗耀祖。贾府第四代子孙以“玉”字旁命名，贾珍、贾珠、贾琏、贾宝玉等，暗合了子孙“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讲究排场，坐吃山空。到了第五代，命名皆有草字头，贾蓉、贾蔷、贾芹等，贾府经过百年富贵荣华之后，子孙不肖，尽成草包，已到了草枯荣败、凋零衰颓之时。

我们大多数人，在使用着字辈，但未必知道，这些字辈的来历。

去年，我们县有张姓的家族续修家谱，需要在原字辈中续加字辈。为首的一班人也是呕心沥血、咬文嚼字，推出了几种版本的二十个字辈，负责编纂的族人，推敲来推敲去，都觉得不甚满意。族人中有熟悉我的朋友，他们找到我，先是恭维，认为我多年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写过大大小小的文章，算是一个小文化人；后来就强我所难，把后续字辈定稿的任务交给我。

我对他们提供的几种版本的字辈进行过研究，发现有这样一些问题：有的字太生僻，比如“祯”“肇”；有的似太通俗，比如“奋发”“宁静”；有的是多音字，比如“行”“长”。最突出的问题是，五个字组合在一起，只是汉字的机械排列，不能表达明确的意思，比如“卓誉策项函”，“景励安梦方”等。我是个迂拙的人，受人之托，从不敢敷衍，况且要给他们家族后二十代定字辈，更不敢草率从事。于是，我研究他们家族前二十代的字辈：“世可学熬山，宏绍鹿龙志，克孝前先哲，忠恕道自如”，可以看出，他们的先人制定的字辈中含有“修身齐家、安国治民、吉祥安康、兴旺发达”等价值追求，新增加的字辈要承接这个传统。

当今是个崇尚文化多元的年代，给后辈取名自然可以各随其性，各极其致，趋时化、趋洋化，似都无可厚非。但是，我们不能数典忘祖。字辈是一个家族传承的路线节点，是一个家族文脉的积淀和家风家规的概括表达，字辈文化也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知道，文化是一种“软实力”，这种“软实力”要能发挥作用，必须借助于一定的媒介，必须打造出具体的形态。字辈，就是一种便于固定、便于实行、便于审视、便于继承的家族化的文化形态，是一个家族文化得以延续的缆索。我们相信，只要这个形态在、缆索在，后人就可以抚摸到祖先的根脉，先辈凝聚的精神种子就有可能存活，家族优良的文化传统就不可能随风飘散。

电视剧《父母爱情》剧照

古人春节如何拜年

刘中才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当人们卸下兔年的繁忙，龙年春节也悄然而至。在快节奏的信息化时代，越来越多的人吐槽情感渐淡、年味渐少，小时候那种盼年的感觉也几乎消失殆尽。其实，年味的缺少并非因为社会变化导致，却是因为我们过分地注重物质追求而忽视了文化传承，单从春节拜年一事上就足以说明个中问题。

身处知识经济时代，过年丝毫没有庄重感，打个电话、发条短信，抑或在朋友圈里送上一句祝福语就把拜年一带而过，其中的敷衍自是不言而喻，没有年味也见怪不怪。这样的拜年形式与古人相比，真可谓自惭形秽。因为古人对拜年的讲究，由内而外都传递着浓郁的艺术文化气息。

国人春节时兴拜年的习俗最早可追溯至两汉时期，东汉名士崔寔在文化专著《四民月令》中记载“正月之朔，是谓正旦。洁祀族祢，进酒降神毕，子妇曾孙各上椒柏酒于家长，称觞举寿，欣欣如也。官府僚属亦往来拜。”这里说的是正月初一官宦人家的拜年场景。大人孩子穿戴一新，先向神灵敬酒祭拜，晚辈再依次给年长者奉上椒柏酒，各家之间互相来往拜贺，觥筹交错，其乐融融，浓浓年味在不经意间流淌出来。

对于普通人家，拜年也很讲究。南朝民俗学家梁宗懔在《荆楚岁时记》里就曾说过：“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长幼悉正衣冠，以此拜贺。”鸡叫的时候就早早地起床，先是在院子里放鞭炮，不管男女老少都穿戴整齐，互相恭贺新年。古代的普通老百姓文化水平虽然不高，但是拜年讲究热闹喜庆，而现在过年时大都不再钟情于穿新衣戴新帽，至于燃放鞭炮更不可能，过年与平时几无差异，拜年的气氛也寡淡冷清。

对于士大夫阶层，拜年的方式则更有新意。如宋代文人周辉在《清波杂志》中记载：“元佑年间，新年贺节，往往使用佣仆持名刺代往。”意思是说，宋朝哲宗时期，士子们通常让家中仆人投递飞花帖代替拜年。这是何意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古代文化人在外游学期间，经常结交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大多学识渊博、意趣相投，但是古代交通不便、路途遥远，逢年过年互相拜访难以成行。为此，这些士大夫便让家中的仆人带上自己亲笔写好的拜年帖投递给远在异地的朋友，送上新年祝福，以表挂念。

何为“名刺”？简单来说，就是将印有梅花的红色纸笺，裁剪成两寸宽、三寸长的卡片，写上受贺人的姓名、住址以及吉祥话语，这便是现代贺卡的雏形。投名刺拜年最初只流行于士大夫一族，明代开始逐渐延伸到普通人家，因此，明代春节期间，处处可见拜年帖。明代书画家文征明曾经在《拜年》里形容过当时的场景：“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来满敝庐。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情嫌简不嫌虚”。可见当时通过投递名刺以来拜年已经颇受欢迎。许多大户人家亲朋好友多，投递拜年帖的仆人常常络绎不绝。为了方便接收拜年帖，他们会在门外的墙壁处挂上专门收受名刺的盒子，类似于现在的报箱。

古人不仅重视拜年，还在拜年仪式上赋予新意。晚辈给长辈拜年要叩拜或者作揖，同辈之间应互相鞠躬，女性之间则要道贺万福，普通人甚至不相认识的人迎面而遇要行拱手礼。这在古代都是拜年的意思表示，而现在，即便见面也只是寒暄几句，真正的拜年习俗几乎消失于人们的视野中。